

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江原武一

自 1984 年設置臨時教育審議會以來，日本的高等教育受到改革浪潮的洗禮，以課程的改革以及導入大學的自我檢查與評鑑為主，進行各種的改革。在這篇論文中，整理了這種改革的背景，同時嘗試釐清在改革之際應特別考慮的重點。進行高等教育改革不只是日本，在北美及西歐等先進國家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課題。而這也由於先進諸國的高等教育在 70 年代後半以後，即自大眾階段逐漸移至後大眾階段之故。在「後大眾化」階段，產生了以下的情形：(1) 在急速的擴增後，處於平板不昇的狀態，因此被迫對於以前認定是永續擴增為前提的大學觀進行檢討。(2) 高等教育的規模與結構應如何規劃？門戶應開放給哪些人？及應以何種條件開放？重新被討論了。(3) 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援助，已經不能給予過多的期待。(4) 一般已認為各大學應對各自的經營負起責任，且各大學應以最適當的方法，依靠自助努力，以發揮解決具體課題的能力。現在的高等教育改革，在這些條件下，並以日本高等教育的歷史發展及文化特性為基礎，被要求建構一國際通用的日本型高等教育制度，而其要點有以下幾項：(1) 一方面對期望升學者盡量廣開門戶，同時另一方面為確保獲得國際認同的質的水準，對同世代應有多少比率的大學生才恰當，應有明確探討的必要。(2) 站在歷史發展的基礎上，應明確訂出在日本教育制度中，高等教育的應有定位及功能。而那時重要的是，在日本的高等教育中，學生期待學得基礎的「一般教育」及「專門教育」。(3) 由於學生期望教導容易瞭解的內容，及編製可給予學生滿足的課程，但大多數的日本大學教員卻都比較重視研究，不重視教學。因此對於改善學部教育容易實施的是，要求大學教員將各自的專門領域的基礎部分，以自己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儘可能正確地教導給學生。所以現在所謂的「專門教育」，可能會逐漸被統整到一般教育

或教養教育中。

壹、行政主導的高等教育改革

日本的高等教育目前正居於轉換期，正被改革的浪潮沖洗著。到底這波的改革自何時起，常因論者之不同而有所相異，但一般而言，可溯自 1984 年設置臨時教育審議會（簡稱臨教審）開始探討起應是合理的。單就行政角度的改革動向而言，自那時起到 1997 年（平成 9 年）開始運作的第 16 期中央教育審議會為止，10 多年間公布了很多諮詢報告等相關文件，依據那些報告，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就一項項被推動起來。

臨教審從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亦即重視個性和轉移至終生學習體系的觀點，提出了四個諮詢報告，針對教育的全盤問題提出了各種建言。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建議，綜合其後的改革動向，可整理成以下的特色。

首先，有關高等教育政策的大方向，幾乎都容納在這些諮詢報告中。例如有關高等教育改革論述中常被使用的重要術語，如個性化、高度化、多樣化、大綱化、個別化、活性化等各種改革方向，都普遍出現在各種諮詢報告中，由此可以證明之。

不過，臨教審所建議的教育改革的全般內容，正如有些意見指出其提出的目標過分曖昧，這些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所描繪的日本大學藍圖，以及改革的最後目標到底為何並不是非常明確。1997 年 10 月開始運作的第 16 期大學審議會，接受來自文部大臣「有關 21 世紀的大學理想藍圖和今後的改革策略」之審議要求。這是大學審議會設置以來，事隔 10 年的具鉅觀性的諮詢內容，而其檢討的第一個課題是 21 世紀的理想大學圖像，這表示它被再次要求必須針對未來的大學改革方向，具體地向國民加以說明。

第二，臨教審的思考模式，很濃厚地回應了 1980 年設置的第二次臨時行政調查會（簡稱臨調）的行政財政改革理念。這「第二臨調」的目標是對於逐漸嚴重的財政困難，強調以「不增稅方式重建財政」的方式，進

行行政財政的改革，同時以緩和管制等措施，意圖活用民間的力量。在臨教審的諮詢報告中，提出一方面留意和行政財政改革的關聯性，一方面在改革的方向上，強調應致力於資金的重點式與有效的分配，必須和國家財政的整體配合，規劃適切的財政措施不可。另外，雖說對於高等教育素質的提昇，充實公共支出是不可缺的，但同時，應要求進行多元化大學資金的導入，以強化並充實自主的財源基礎。這樣的想法成為其後一直被延續著的高等教育政策的重大底流。

第三，要求各大學對於高等教育的改革，基本上要體認其各大學自己的問題，應主動加以面對，並且應認識其使命與責任而努力改革，不要背逆了社會的期待與信賴。亦即是說，政府在改革的基礎條件上，雖然實施了自大學設置基準等法令的大綱化等制度上的改革，也在資金的重點式及有效的分配上，做了適切的財政措施，但具體的問題解決，應由各大學以各自最適當的方式，以自助努力的做法加以實現可行的思考方式。

第四，建議應設置能審議日本高等教育的政策，並對大學提供必要的建言與援助，且成為對文部大臣具建議權的常設機構之「大學審議會」。之後大學審議會於 1987 年設於文部省下，接受文部大臣「有關在大學等機構中，如何促使教育研究的高度化、個性化及活性化的具體方案」的審議要求後，發表了很多的諮詢報告及一般性報告。文部省以接受其建議的方式，具體地修改了高等教育的相關法規及實施各種政策。這項設置大學審議會，以審議高等教育重要政策的建議，可說是臨教審建議中的重要項目，其後，行政主導的改革就急速的被推動著。

其次，對應於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進展，被要求進行自發性改革的各大學，如何進行各種改革呢？現在進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直接契機是 1991 年大學設置基準等的大綱化。觀察自那時起各自大學的改革狀況時，有如下的情況：在 91 年至 96 年度為止，93 % 的大學實施課程改革；同樣地 85 % 的大學實施自我檢查及評鑑，而實施結果有對外公布的有 57 %；另外在此期間，實施學生教學評鑑的有 38 %。有關教學方法的規畫

與改善方面（96 年度），有製作教學大綱的有 86 %，開設配合高中修課狀況的教學科目的大學有 41 %，有進行教師研修（faculty development）的有 32 %。有關配合大學開放的內部組織改革方面，實施甄選社會人的大學，其中學部有 45 %，研究所 48 %，將近半數；訂定學分互相承認的大學，在 95 年度有 55 %，超過半數。由此可知，在短期間內有很多大學已實施了改革。雖然各改革事項，其進展有所不同，但就整體而言，著手進行改革的大學，就數字上所顯示的大部分是國立大學。

正如上述雖有很多大學進行改革，但應如何評論這種行政主導的高等教育改革呢？而現在的改革，又是基於何種理念呢？今後的改革，重點應放在何處呢？為了從比較教育學的角度分析上述的課題，下文首先自改革背景分析起。

貳、改革的背景

高等教育的改革，不只是日本而已，在北美及西歐等先進國家，也是教育政策的重要問題，聚集很多人的關心。若將此背景追溯自 70 年代後半，將先進國家的主要改革背景加以歸納的話，則有以下的重點。

第一當然是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世紀中，無論是那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規模都大幅擴增。這高等教育戲劇性的擴增，首先是自美國發起，其次是加拿大和日本，並波及到西歐各國，然後是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等第三世界。因為大家都認為，高等教育的擴增，能促進科學知識的進步與普及，並培養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以促使經濟成長。由於各國政府都想因教育的普及，以改善社會的生活條件，加上各國國民都想透過教育，成功獲得社會地位，這種對教育需求的增加，乃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教育整體的爆發式普及，也促成了高等教育的擴增。

依照 1997 年度日本「學校基本調查速報」，日本的大學及短期大學升學率（包括重考生）共 47.3 %（其中男生 45.7 %，女生 48.9 %），進

而若加上高等專門學校（即五專）四年級等的在學者 0.6%，以及專修學校專門課程（高中畢業後的職業進修學校）的升學者有 19.5% 的話，事實上已有近七成（67.5%）的同年齡層年輕人進入高等教育。這種高等教育的升學率（只指 full time），若和各國比較的話（1992 年的數字），除了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國外，OECD 的 18 個國家的平均率為 41.1%，其中德國（49.0%）、法國（48.0%）、英國（36.9%）等比較時，日本（55.0%），是和瑞典（52.0%）並列，是世界上比率最高的國家。

這種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帶來了一、學生的多樣化；二、公共費用負擔的增加；三、高等教育制度的質變等各種亟待解決的課題與問題。例如隨著學生的多樣化，必須配合他們多樣的能力、興趣與關心的課程調整及設備改善，另外，教授法等學習環境的改善與調配等，都成為大學相關人員的緊急課題，而他們畢業後，社會的接納方式及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另外，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增，導致的經費增加，到底政府費用負擔應增加到何種程度才好呢？若是轉嫁到受益者付費的話，其對象應是學生和其家族呢？或是以企業為主的雇方呢？然後是為了強化及充實財源基礎起見，財政來源的多元化應如何進行呢？這些高等教育財政相關問題的檢討，都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而做為大眾化學生的「接納機構」，西歐先進各國，都在傳統大學的機構外，另創設「非大學機構」及其他（以日本為例即短期大學與專修學校），但這種方式的得失利弊，一直都是討論的焦點。

且說，和現在高等教育改革相關的一項問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大部分的先進國家，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前半，高等教育的規模雖然都大幅提升，但 70 年代以後的擴增並不是很多，並非是右肩直上的上昇曲線。例如最早步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美國，也在 70 年代後半以後，出現了鈍增情形，直到目前幾乎呈平面情況。德國、法國及英國等西歐各國，在 60 年代出現大幅增漲後，70 年代以後腳步放慢，但其後因政府的擴增政

策，80 年代後半以後再次逐漸擴增。而日本方面，大學及短期大學的升學率，在 76 年以後，都在 30 % 左右移動，超過 40 %，並在 18 歲人口開始減少的 1993 年時繼續上升。

這種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走向新的位相，也受到下述社會經濟變化之重大影響。可是很重要的是，在各國教育制度中，高等教育的位階與功能，是和義務教育及後期中等教育不同的。無論那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了確保做為一個國家所必備的統合與發展，都致力建構一個能使所有國民獲得在現代社會都能通用的基礎學力和擁有共同文化的義務教育。而 60 年代教育爆發的時代，無論怎麼說都是以擴充建設後期中等教育為其主要的課題。由當時的教育理念來看，不管是普通教育或職業教育，延長義務教育後的教育年限，是個人或社會雙方最期盼之部分。

相對於此，高等教育不管在那一個國家，在廣義的意義上，基本上都定位在發揮培養高度的專門人材，以及社會的菁英。雖然希望儘量對有意願者廣開門戶，但不會認為可使所有的人，在同一條件下都能進入。這樣的見解，即使在已經相當大眾化的今日，也是一種主要的看法。我認為很多的先進國家，其高等教育並沒有像後期中等教育採取同一方式進行大眾化，也沒有達到同樣水準的就學率，就是因為有這樣的高等教育的理念所致。

第二個改革的背景是，1973 年和 1979 年兩次石油危機為其關鍵，先進國家的經濟走入低成長的時代。產業結構中，資源和勞動較集中的重化學工業部門逐漸衰退，電腦及高科技的知識型產業，和銀行及證券等服務經濟部門逐漸成長。這種經濟結構的變化，對於包括高等教育的整體教育，有如下的影響。其一，為提昇低迷的經濟，確保國際經濟競爭能力，乃致力加強提昇國民整體的基礎學力，以提高人力資源的水準。同時另一方面，培養發展尖端科學技術人才的努力，成為國家的重要課題。而隨著雇用機會的減少，失業問題的惡化，國民企圖獲得更有利的就業機會，於是學生的高學歷傾向亦更加增強了。

其二，因經濟低成長所導致的低稅收，導致對於高等教育的公共財政支出的限制，同時也要求在有限財源下的有效運用。在嚴苛的財政緊縮政策下，高等教育的規模應如何適度的擴大，不管在那一個國家，都成為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課題。在改革的議論中，大學認可（accountability）和大學評鑑亦逐漸受到重視，也是這個原因所促成的。

第三是「大政府」模式成為批判的目標，大家都朝向小規模的政府模式。設置大規模政府的哲學是認為擴大政府的權限，對於解決各國直接面對的問題是不可缺的，因為這樣才能實現公益及推動改革。西歐和北歐各國中，建設社會福利國家，及美國詹森政權「偉大的社會」計畫，都是以設置大政府機構，以建設國家的理念。

可是進入 80 年代以後，以英國的柴契爾政權和美國雷根政權為主，重新檢視這種大政府的問題，在經濟政策上推動自由放任和大幅減縮社會福利政策，與其說重視社會互助，不如說重視自助努力，逐漸轉向於「小而美」的政府。這是期待民間活力的展現，強調市場原理的效用的新保守主義的出現。日本的「第二臨調」雖然也一面強調充實社會福利，但基本上是建議走向小規模政府的路線。日本臨教審以後的高等教育政策依照這樣的路線，推動緩和管制及各自大學的自助努力改革，以及財源的多樣化，都是這種理念的延續，這是不用再強調的吧！

參、邁向「後大眾化」的改革

果如上述，那可說包括日本等先進國家的高等教育，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前半，經歷了急遽的擴增以後，70 年代後半以後，走入了重整的時期，亦即是說，進入了「後大眾化」（postmassification）的時期了。

這所謂「後大眾化」的術語，含有下述的意涵。一、處於急遽擴增結束後的平板狀態，開始進行對至此為止以永續擴增為前提的大學理念的檢討，二、高等教育的規模和結構應是如何，門戶應該開放給誰，以及應以何種條件開放等都重新被檢視，三、來自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援助，已經

不能期待，四、政府對於改革的基本條件之提供（以日本為例），雖然實施如大學設置基準等的大綱化為主的制度改革，以及強調資金的重點式及有效的分配的適當財政措施，但具體的問題解決，仍強調應由各國大學，以最適切的方法，用自助努力的方式加以克服，日本政府便是以這種方式在推動政策。

目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乃在這些條件下，基於日本的高等教育歷史的發展及文化的特性之基礎上，尋求建構國際通用的日本型高等教育制度。而高等教育大眾化所導致的問題，也仍是處於尚未解決的狀態。即使是最早達到大眾化的美國，也不能說已對大眾化的衝擊有十足的因應之道。對於外在的壓力比較能敏感因應，且較具彈性結構的美國高等教育制度，雖然做為所謂「美國模式」，對其他的先進國家及第三世紀的高等教育改革，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其本身仍然存有很多問題，至今為止仍在嘗試各種的改革。可是對於在明治時期，移植至日本的「德國模式」，其影響力仍然很大的日本高等教育，有關因應大眾化之對策，仍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麼，後大眾化的改革，應將重點置於何處呢？各國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受到世界動向的影響，一方面摸索建構和他國不同的獨自制度，在這僅僅一世紀中急速發展而來的日本高等教育亦不是例外。在此由於篇幅所限，只針對將來建構日本的大學理想圖像，應注意的條件提出幾項重點加以敘述。

第一，有關同年齡層應有多少比例是大學生的問題。依照卡內基教育振興基金會（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所做的「大學教授職位國際調查」，世界各國的大學教授平均來看，認為在同年齡層或同世代中，例如 18 歲人口中有 64 % 具有修完中等教育的能力，進而在修完中等教育後的人數中有 56 %，應允許其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就讀，他們做這樣的回答。因此將兩個數字加以計算，則可認為同世代或同年齡層應有 36 % 的比例，使其進入大學或短期大學（二專）等高等

教育機構應是恰當的。有關大學升學容許度以國別而言，美國大學教授的接受度最高，依他們的看法，認為大約 47 % 近半數應能接受高等教育。而日本則有 41 %，和瑞典的 41 % 並列，韓國大學教授則認為有 31 %，德國則認為應有 26 %。

因為這個調查結果，是大學教授的看法，因此數值較易偏低。可是就日本高等教育之問題而言，即使僅就大學和短期大學的升學率來看，就已突破 47 %，超過大學教授所認定的容許度範圍，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已是如此的進展了。包括日本，幾乎所有國家的大學教授，都認為應廣泛開放高等教育的門戶，擴大升學的管道，對此總的目標都是贊成的。而且認為為確保國際的經濟競爭能力，做為國家的目標，不僅應培養先端科學技術發展人才和廣義的社會菁英，另外亦應由提升國民整體的基礎學力，以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而高等教育亦應負擔這一部份的責任。

可是在此情況下，日本的高等教育，一方面要對期望升學者儘可能廣開門戶，一方面為確保國際通用的素質水準，對於高等教育的理念與政策方針，亦應由整體性角度或個別大學角度進行綜合的檢討，以及著手進行入學後的升級及畢業條件的標準化和進路指導體制的制度性規畫不可。像目前已達準義務化的後期中等教育一般，完全接受所有的學生之事，不論自學生的能力、興趣或關心的角度來看，或從公共經費負擔的角度來看，都不是實質正確的方案。另外，雖說終生學習的需求提高是事實，但提倡轉移至終生學習體制，我認為只不過是將此問題的解決往後推延而已。因為高等教育機會要達到何種程度，會和一旦進入社會的成人學生升入高等教育的機會相關之故。

第二，以至今為止的歷史發展為基礎，明確理解日本教育制度中高等教育的定位和功能。為了說明起見，在此舉一具體事例，即高等教育中一般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處理方式而論之。為何呢？因為一般教育，在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高等教育雖然都有實施，但在西歐各國的高等教育，和此一般教育相似的教育原則上是沒有的。

以英國為首的，包括德國和法國等的高等教育，至此為止的教養層面，是接受「大人」的學生進入，亦即接受在入學前已經具備基礎教養的學生，對他們實施職業專門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目的。極端而言，學生至後期中等教育為止，因為已經學得一個具教養的成人所應具備的基礎知識、思考方式及行動方式，因此認為高等教育只提供特定的專門領域及和職業有關的職業專門教育即可。

可是美國的高等教育，因為接受在身體上也許已經是大人，但教養層面仍是「半大人」的學生，因此對他們實施基礎的教養教育和應用的職業專門教育，成為高等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美國的大學學部教育，因大學的種類不同，而在一般教育和教養教育（liberal education）等組合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對於培養學生能成為具教養的成人的教養教育都是非常重視的。另外，職業專門教育雖然也被編入學部教育中，但擔負主要任務的，則是在制度上屬於別的組織的研究所中。

日本的高等教育也自明治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大致採取和今日的西歐高等教育制度同樣的立場。可是戰後教育改革中，包括高等教育，日本的教育制度。整個在美國的強大影響下進行了改革。而且新制的大學，除了包含舊制的大學，更包含舊制的高中和專門學校，進而連師範學校都在內，進行整編的改革。從傳統的大學理念來看，將舊制高中3年和舊制大學3年，共6年的期間縮短為4年即是新制大學。另外即使分析這半世紀的改革，也會發現是以美國模式做為「穿衣鏡」，參照之並改革而來。當然如果詳細比較的話，相異點可能也不少，但現在的日本高等教育，比起西歐各國，可說更具美國高等教育的特徵，高等教育中的一般教育的處理即是其中之一。

亦即，在日本的高等教育，學生也期待同時能學得教養教育和職業專門教育。但日美的差異處特別明顯的是，日本的學部教育，比起教養教育，顯然更重視職業專門教育；另外是研究所的規模並沒有特別擴增。有關高等教育的定位和功能，其他應考慮之處一定還有幾項，但無論如何，

若不站在發展的歷史上，一一系統的檢討各項重點的話，實際上是無法描繪可能實現的大學理想圖像吧！

第三，有關學部教育中，課程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依據日本私立大學聯盟在 1994 年實施的「第 9 次學生生活實態調查」中，學生要求充實教養教育，並期望能編製簡單明瞭的講義，及能讓學生滿足的課程。但相對於此，現在的課程改革，都是大學教師主導的，總是流於編製學問體系的課程方向。日本的大學教師，比起教學都比較關心研究，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何況教學和研究雖然是相關聯的，但其各自目的是相異的，在方法和必要能力也是不同，這兩項工作的性質，是不能自然調和的。

考慮到這樣的現況時，為達到能照顧到學生需求的教學，對大學教員能實質期待的是，對其各自專門領域的基礎部份，在各自能充分理解的範圍內，儘可能地能正確地傳達給學生即可以了吧！那樣做的話，現在所謂「專門教育」的部份，會逐漸走向「教養教育」化的方向，這在學部教育中的課程改革中，我認為不會是矛盾的。而這無論是四年制大學或短期大學，或說是名校或非名校都是通用的。

最後，有關在現在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有關強調個別大學的自主改革之事，略做一些詳述。已如上述，日本臨教審後的高等教育政策，是以第二臨調的路線為主，自「大政府」朝向「小政府」的改革方向，並以緩和管制，個別大學自助努力的改革及財源多元化等方式在推動著。而被做為「關鍵語」的術語，包括民間的活力及市場原理，或效率化、活性化及個別化等術語。以經濟界的術語而言，或許就是弱肉強食或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等術語。可是這些政策在教育的領域實施之際，有關其適用性及可能性，以及具體的方針和政策，應有必要在事前進行充分的檢討。

例如美國的大學相關人員談「市場原理」時，是因為在 10 年間有 200 所大學新設，但同樣地有 100 所大學關閉，整體而言有 100 所學校增加，他們是以這樣的意涵在使用著。而實際上自 1970 年至 1993 年為止的 23 年間，四年制有 178 所和二年制大學有 168 所，合計 346 所學校關閉

，另外，卻有超過那些更多的學校新設，學校數全部增設 1113 所。

可是對日本大多數的大學相關人員而言，對於這種競爭社會的狀況有多少程度的感受呢？其次，具有濃厚社會福利色彩的教育改革，又豈能容忍上述的情況發生嗎？

進而，雖說日本公共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支出，所占 GNP 的比率比起先進國家仍然偏低，但做為國家的總目標，要確保國際的經濟競爭力，如果將責任放在高等教育身上的話，那當然應有適度的公共財源投入吧？

參考書目

市川昭午（1985）。臨教審以後の教育政策，教育開發研究所，頁 31-32。

黒羽亮一（1993）。戰後大學政策の展開，玉川大學出版部，頁 199-209。

館昭編（1995）。轉換する大學政策，シリーズ現代の高等教育 1，玉川大學出版部，頁 10-13。

文部省編（1996）。我が國の文教政策（平成 7 年度），大藏省印刷局，頁 2-11。

文部省高等教育局大學課大學改革推進室（1997）。大學におけるカリキュラム等の改革状況について

P. G. アルトバッカ（馬越徹監譯）（1994）。比較高等教育論—「知」の世界システムと大學，玉川大學出版部，頁 20-25。

Teichler, U., (1988),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experience of three decade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OECD/CERI (ed.), (1995), *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 Paris:OECD,

（文部省大臣官房調査統計企畫課監譯（1996）。圖表でみる教育 OECD 教インディケータ，ぎょうせい。）

アラン・ワグナー（金子元久譯）（1995）先進諸國の高等教育改革，近未來の大學生像シリーズ「現代の高等教育」3，玉川大學出版部。

Harman, G., (1992), Governance,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 Introduction", in: Clark, B. R. & Neave, G. R.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 Vo1.2, Oxford: Pergamon Press, pp. 1286-1289.

江原武一（1994）。大學のアメリカ・モデル—アメリカの経験と日本，玉川大學出版部。

Zemsky, R., (1997), Seminar on Post-Massification,in: RIHE (ed.), *Academic reforms in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 in the Massification S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RI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Reports No.10), Hiroshim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pp. 4-6；

廣島大學大學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編（1997）。ポスト大眾化段階の大學生組織變容過程に關する比較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叢書 46，廣島大學大學教育研究センター，頁 1-7。

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江原武一（1994）。現代アメリカの大學生—ポスト大眾化をめざして，玉川大學出版部，頁350-262。

江原武一編（1996）。大學教授職の國際比較，玉川大學出版部。

Clark, B. R., (1992),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in: Alkin, M.C. (ed.),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ixth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P.207.

日本私立大學連盟，學生部會第一分科會編（1997）。新しい大學のあり方を求めて，開成出版。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995),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5*, Washington, D. 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p.247, p.249.

江原武一，現任日本京都大學教部學部教授

譯者：楊思偉，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高等教育の改革は、世界の高等教育の現状と問題を理解するうえで、重要な参考となる。本稿では、主に米国と日本の高等教育の比較を通じて、高等教育の改革的方向性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まず、米国の高等教育の現状と問題点を概観する。米国は世界有数の高等教育大国であるが、その一方で、高等教育の多様化や質的変化が課題となっている。また、大学の運営や評価なども問題視されている。次に、日本の高等教育の現状と問題点を概観する。日本の高等教育は、世界でも高い評価を受けているが、一方で、大学の運営や評価なども問題視されている。最後に、米国と日本の高等教育の比較を通じて、高等教育の改革的方向性について考察する。米国では、大学の運営や評価なども問題視されている。また、日本の高等教育は、世界でも高い評価を受けているが、一方で、大学の運営や評価なども問題視されている。最後に、米国と日本の高等教育の比較を通じて、高等教育の改革的方向性について考察する。